

第一部

茶史茶俗

相传在神农氏年代，茶叶就被当作治病的良药，《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介之。”“茶”即古“荼”字。东周时代，烈王姬喜二年（公元前374），茶叶曾一度被当作补品饮用，在《诗经》中有：“谁谓荼苦，甘之如荠”可佐证。

第一章 东阳茶史

第一节 汉代东阳茶业的渐兴

一、茶叶的功用

茶叶是我国古代先民最早开发的野生植物之一。茶叶内含咖啡因、单宁、芳香油、植物性蛋白质和维生素 C 等成分，这些成分有提神、醒脑、利尿的功效和帮助消化的作用。后来与咖啡、可可合称为世界三大饮料。

相传在神农氏年代，茶叶就被当作治病的良药。《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介之。”“荼”即古“茶”字。东周时代，烈王姬喜二年（公元前 374），茶叶曾一度被当作补品饮用，在《诗经》中就有：“谁谓荼苦，甘之如荠”可佐证。早在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 59），王褒寓居成都，买亡故之友家僮订立僮约之时，也有“武阳买茶”和“烹茶尽兴，酬已盖藏”之句子，证明在公元纪年之前茶叶已经成为商品。到了公元 2 世纪，东汉名医华佗在《食论》中也曾谈到“苦茶食之，可以益且用”。公元 569 年，隋文帝患上脑病，遇僧人告以煮茗草服之，果见其效。

年长月久，我们的祖先在实践中不仅体味到茶叶有种种药用的功效，茶水也便渐渐演变为人们日常所喜爱的清心提神之饮品。“清茶一杯，元气百倍”，成为千古流传不衰的农谚。

（郭承豪）



郭闪璫 / 画

二、古代的史记

东阳设县始于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距今已有1800年之久。东阳茶业的渐兴，在时间上说，不会晚于东阳县建制的产生。关于这一论断，《山越史》上有着明确的记载：“吴国境内山越所居之地，有会稽、东阳……九郡。会稽以东以南分添郡县，渐次开辟，农业渐兴，本土所产竹木盐茶之利，不可胜数。”由此可见，追溯东阳产茶的历史，至少在1800年以上。到了南北朝刘宋年间（420–479），刘义庆《世说新语》曰：“褚太傅初渡江，尝入东……多与茗汁。”褚太傅即褚伯玉。《道光东阳县志》载，褚伯玉当年曾隐居于东白山，喝的就是东白名茶。唐代陆羽所写的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称：“婺州东阳县东白山，与荊州同”（荊州茶为当时名茶之一）。与陆羽同时代的李肇著《國史補》也将东白茶与蒙顶石花、顾渚紫笋等15种茶叶列为唐朝名茶。《淵鑒類函》卷中则提到：“茶，唐史曰，婺州有东白。”此外，《浙江通志》中《东阳山水记》进一步记载：“唐宋时，有司常治茶于此，设茶院。”此“此”就是巍山茶场村，说得更为具体。历代史记表明，东阳茶业自东汉以降，历经1800多年，都在不断发展。

(王湘)

三、道家的功绩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道教的影响，东阳当然也不例外。在东阳的岘山、甑山、八面山、双岘峰、巍山屏、落鹤山、大盘山、玉山及以东白山为主峰的会稽山一带，建有诸多道观，道士注重种茶喝茶修道，为饮茶之风在民间的盛行，为茶叶的种植、茶道的出现和茶文化的积淀奠定了基础。

道士劈山植茶乃为养生之用。道家以茶招待宾客，为饮茶习俗的广泛传播于民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汉代至隋代，东阳这方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热土，曾不断地吸引许多名士，诸如申屠蟠、葛玄、葛洪、褚伯玉、陶弘景等道家学者。他们离开官场，隐居东阳，钟情事茶，以茶会友，以茶作诗，以茶养生。他们以饮茶作养生捷径，促进了茶叶种植在东阳地区的推广。

东汉末年，儒学大师申屠蟠厌恶官场，为避征出隐梁砀（安徽砀山县），转隐屠山，后虑逼迫，辗转南下隐居东阳禹山（又称夏山、八面山）。申屠蟠“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后汉书·申屠蟠传》）。在禹山种茶，并设茶亭，供茶水于路客。其学生桓典也曾离开官场，跟随老师一年，一起垂钓，一起品茗。申屠蟠九世孙征南大将军申屠狄征蛮航海，舍宅为寺，成为千年古刹大智寺，其茶水清香佳味颇吸引人，曾有诗赞道：“半日得闲僧煮茗，一股清味几盘桓。”（桂溪希俨《禹山十景诗》，见同治九年卢玑主编《吴宁厉氏宗谱》）

不愿仕进的老庄学说传人老仙翁葛玄（164—244）由天台入东白山，虔诚修道，功德圆满。据《天台山志考》记载：“汉朝隐士葛玄者，植茶圃于华顶山，山中多雾，萌发较迟，冬季严寒，茶树多有冻死，故产不多，仅供山居而已。传至隋朝，由华顶山寺开山祖师——智者僧，又在山上拜经台广植数亩……”（《天台山志考》）

晋代许孜的墓葬在今虎鹿镇虎峰山虎峰寺西侧，由高大的千年苦丁古茶树掩映着。当年“孝友恭让，敏而好学，尊师敬亲，仁笃乡里”的许孜，身后何以安厝在这里，



郑金城 / 画

难道不是喜饮苦丁茶之故？

葛玄孙子葛洪循祖父行踪，于东晋时入东白山，寻访高士，采集中草药，医治疑难杂症。葛洪认为茶叶是药中之王，遵照他祖父在东白山种茶经验，选择土质好，气候适宜的地方植茶。据说现在葛英和茶坊（东阳与嵊州交界处）是他种茶的地方，瀑岭仙茶源出于此。

《剡录》一书记载了赵广信、褚伯玉在东白山治茶二事。其一，“太白山、小白山，峻极崔嵬，吐云含景，赵广信所仙也。双石笋对立如阙，有赵广信丹井。瀑泉怒飞，清波崖谷，称瀑布岭。岭中产仙茗。”其二，晋太傅褚伯玉（394—479），在刘裕篡晋称宋时隐居东白山潜心制茶，《剡录》云：“隐居东白山不仕，称道士，治茶炼丹。齐高帝为之筑太平馆。”“褚伯玉在西白山住卅多年。”他种茶，并对茶很有研究，他说：“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

据1993年版《东阳市志》记载，茶叶“以东阳木禾种为上。相传东晋太傅褚伯玉从湖北襄阳引种，后衍生为木禾茶、笋头茶、紫芽茶、瓜子茶等。”如此看来，褚伯玉称得上是一位为东阳引种茶叶的祖师爷。

吴宁之南西岘峰北麓有一座陶岩殿，其碑记云：“昔陶弘景尝登此山而得名。陶弘景（451—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南朝齐高帝时作相，引为诸王侍读十年。辞禄，从东阳孙游岳受符图经法。”（《大寺下村志》2010年版）孙游岳何许人也，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是，陶弘景到吴宁隐居西岘峰，饮茶论世，却是不争的事实。

千古东阳，“且夫引山川之胜，控都会之交，名人骚士，动态游览，寄咏陶情，恒在乎此。”（康熙《东阳县志》卷之二十四寺观）。东阳有山有水有胜境，适宜隐士生存，而隐士们的到来直接促进了东阳茶业的早期开发。当时在东阳零星种植在田间小道旁的茶叶不计其数，这是民间自家茶的重要来源，东阳本地居民消费茶叶，大多属于自产自销。

（郭承豪）

第二节 唐代东阳茶业的发展

一、茶叶的种植

自南北朝至唐代，佛教兴盛，东阳建造了许多伽蓝佛寺，有寺必有茶，有僧

必有佳茗。

据近年出版的《浙江茶叶》《中华茶典》《中国茶业大辞典》等书籍的介绍，唐代僧人素食禁酒，倡行通宵坐禅，茶有解渴和兴奋神经的作用，佛教寺庙提倡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僧侣围坐品饮清茶，谈经论佛，客至敬茶或以自制茶叶酬谢施主，使茶与宗教活动相结合。当时寺观里还设有“茶头”一职，专门为佛龛献茶，为僧僚主持茶仪，为客人供茶。东阳寺院普遍种植茶叶，产地分布较广。据史料记载，宋朝之前，东阳就有梁武帝敕建的禹山大智院、灌顶寺、栖真观、东白山的禅林院、为纪念萧统而设立的昭明院等40余个佛寺梵宫种植茶叶和施



徐新德 / 画

茶。(康熙《东阳县志》卷之二十四寺观)

《康熙东阳县志》记载了如下神奇故事：“白沥澳，阔一丈五尺，深一尺，汇注五里田禾。古传唐咸通六年（865），有异人过此，问土人斯溢乞茶。溢素乐施，令其妻胡氏烧茶奉之。因言此时天旱缺水，其人就地用杖拄之，水即涌出，自是不竭。”此“异人”是佛是仙虽不得而知，但从中却可见乐于施茶已经成为当时民间的风俗。

赵衍曾说：“三代而下，二教盛行，梵宫道刹先后相望。以东邑僻在偏隅，僧道、阴阳设有专司而莫之废，土谷

坛圻，咸得而主之。有若深山穷谷，人迹罕至，则尝栖身其中，垦田种树，与素封比。郊原错处，又无论焉。”（康熙《东阳县志》卷之二十四寺观）。

下面这些佛寺道观就是当年生产茶叶的基层单位。

新安寺，在县东一里六十步，吴宁城区。旧称教寺，为习仪拜节道场。唐咸通八年（867），周泰舍基建，仍舍田一千零百余秤。

洪济寺，在县东二十五里，三都。唐咸通八年（867）斯姓建，曰禅院。嗣后，本姓屡修。

宁国寺，县东南二十五里，旧名宝应，土名奥里，俗称奥里寺，周显德二年（955）建，曰教院。

法宁寺，在县东二十五里，六都。古名元安，曰教院，唐咸通八年（867）建。

崇圣寺，在县东三十里，八都。旧名梵德教院，唐咸通二年（861）斯溢舍宅建。

法兴院，在县东三十五里，旧志云宋咸平元年建，曰教院。而士人相传，云是赤乌二年（240）按其遗迹，殆始于咸平，而所称赤乌亦未确，详见遗事条。

慈云寺，在县东三十五里，十都。旧名清明，唐咸通八年（867）建，曰教院。本寺报称在本都凤山之阿，胡、楼、俞三姓同建。

普曜寺，在县东北六十里西白山中，亦名西白寺，十四都。后晋天福五年（940）胡长官舍建。

资福寺，在县东北五十里虎峰之麓，俗名虎峰寺，十五都。唐咸通二年（861）建，是为禅院。

祥林寺，在县东一百里东白山中，十七都。唐太和六年（832）建，曰教院。

净戒寺，在县东五十五里，二十二都。旧名天竺，汉乾佑三年（950）建，是为禅院。旧碑称隋大德晦迹，兹山，成化孔彰，风闻京刹，赐号紫衣大师，遐迩接踵，听师谈玄。

宝相院，在县东一百二十里，二十五都。旧名下觉，唐天佑乙丑年（905）周文勋同弟文典舍建。并入私田三千六百秤。

利国寺，在县东一百五十里，二十七都。土名横溪，唐广明元年（880）周、厉姓同建。缪志：唐庆元二年（？）建，曰教院。

崇教寺，旧志在县东百八十里，实百四十里，旧名崇福，土名黄旛，二十八都。唐乾符二年（875）建，曰教院，本都报称有黄刺史舍田宅为寺。

兴道寺，在县南八十里，旧名兴国，三十二都。后唐应顺元年（934）建。今俗称赤岩寺。

安福寺，在县南九十里，三十五都。唐咸通八年（867）陈姓建。旧名安文，曰教院。

净胜寺，在县南六十里，旧名合浦，三十七都。唐中和三年（883）建，曰教院。本都报称唐代尚书王弘舍建。

庆安院，在县东南六十里，三十九都。土名桥头寺，唐咸通八年（867）建，曰教院。本都报称乾佑间浦江县丞王弘裔孙王章归老于此，其裔孙尧卿舍建。



贾刚 / 画

宝安寺，在县东南六十里，四十一都。旧名宝宁，曰教院。晋天福四年（939）建。

圆超寺，在县南六十里，四十二都。旧名福寿，唐僧宗运建，后唐长兴四年（932）重建。

大智寺，在县南五十里禹山之麓，四十四都。梁征南将军申屠狄征蛮航海，遇风涛而怖，遂许舍宅为院，因号舍山，梁大同十年（544）建，是为禅院。

灌顶寺，在县南三十里，四十七都。旧名甘泉，为教院。晋开运三年（946）历刺史施建。

灵云寺，在县南六十里，五十一都。唐咸通八年（867）建，曰教院。

昭福寺，在县南四十里，旧作三十五里，五十三都。唐广明元年（880）陈思建，曰教院。孙象叔重修。

法云寺，在县南六十里，五十三都。唐光化元年（898）陈思韧建，裔孙陈懿重修。

元宝观，在县南四十里，五十四都。旧志云四十五里，相传齐中兴二年（502），邑人陈元宝舍宅建，因名元宝宫。

云峰寺，在县南五十里，五十六都。唐景福元年（892）建，曰教院。

静因庵，在县南四十里，五十七都。旧名净安。曰教院，唐广明二年（881）建。

辅德庙，在县西南三十五里，五十八都。相传唐时建县，议将筑城于此，因先建此庙，祀城隍神，至今俗称城隍庙。

天常寺，在县西南五十里，五十九都。唐咸通年间建。

法济寺，在县西南三四十里，俗名祇林寺，五十九都。梁开平三年建。

传法寺，在县西南五十里白龙山麓，六十都。旧名白龙，唐长庆中（821—824）建，曰教院。

义安寺，在县南二十五里，六十一都。唐咸通八年（867）建，曰教院。

灵岳寺，在县南十八里，六十三都。梁大同三年（537）建，曰教院。

法华寺，在县南五里，梁天监六年（507）建，至唐武德而废。至德二年（584），厉乾耀复舍宅建。僧贯休以乾符四年（877）书《雪山道场》四字于此。

般若寺，在县西十五里，旧名天宫，为教院，梁天监五年（506）建。

刘昆侯庙，在县西八里瓶山，自梁逮宋，历年所，而灵爽犹存，可谓盛矣。

法轮寺，县西八里许，六十五都。唐乾符三年（876）建，号岘峰禅院，其前有不老泉。

灵应寺，在县西十五里，六十六都。唐咸通八年（867）建。

广陵寺，在县北六十里，唐咸通八年（867）应权六建。



申屠旭明 / 书

广济院，在县北四十五里，唐咸通间（860—873）康姓舍建，梵僧宝掌卜居于此，数年延去。（以上见《康熙东阳县志》卷之二十四寺观）

《道光东阳县志》还记载了部分清初不存的以下寺庙：

爱道尼寺，县西南二百六十步，唐咸通九年（868）建。

瑞相院，县南九十里，旧名瑞峰，后唐天成三年（927）建。

善法院，县南五里，即罗隐旧宅，僧初栖贤庵之地。

昭明院，即慈圣院，县南一百五十里，旧名昭明，唐咸通八年（867）建。

因果院，县东南四十五里，旧名龙华，梁普通元年（520）建。

慈相院，县南三十里，旧名双法，唐贞观元年（627）建。

普薰尼院，县南七十里，旧名新兴，后晋开运二年（945）建。

延祥寺，县南五十里，旧名瑞安，后梁开平四年（910）建。

崇福广佑寺，县东二十里，旧名宝泉，后晋开运二年（945）建。

福昌院，县西一里，旧名仁寿，后周显德五年（958）建。

（以上见隆庆《东阳县志》，因早废，康熙《东阳县志》不载。）

寺院种植茶叶，是为了提供人们修行之需。赵衍说：“自萧梁以来，时以朝廷之尊，而留心崇尚，舍宅者，变民居为佛寺，出家者化人类为浮屠，骎骎乎未有止极。”“四通之衢，九折之险，恬阴饮阳，足以修行也。”有个“东白白云雾茶”的传说，说的是唐代的东白山上原先住着一个老尼姑，她培育的一种茶很奇

特，茎细皮厚质嫩，在太阳光下有一层光亮，适宜在云雾中生长。泡开茶叶，清澈透亮，没有雾丝儿。而在云雾中生长的茶叶，泡开就能看见一阵淡淡的雾丝儿。这件事被偶然来东白山上采药的名医范汪发现了，遂将此茶树带下山种植。结果，真的有那雾丝儿，以后，东白云雾茶的名气就此逐渐传开。这传说虽奇特，却不失为寺院种茶的一例佐证。

(郭承豪)

二、茶叶的贸易

唐代杨华的《膳夫经手录》云：“歙州、婺州方茶，制置精好，不杂木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费，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当时，婺州东白山茶叶已经销往北方的梁、宋、幽、并等州县，因为其质量优异，商人来往数千里不绝于道。《膳夫经手录》中还记述到：“元和(806—820)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此时全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茶叶贸易集散地，巍山茶场就是其中的一个。

诗僧贯休的诗句点名了东白山生产的茶叶：“境陟名山烹锦水，睡忘东白洞平茶”（《酬周相公见赠》）。东白山茶叶编入《茶经》，列入贡茶，东阳开始出现了以种茶为生的茶农。开成五年（840）十月，盐铁司上奏亦称：“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随着茶叶专门化种植区的形成，促进了东阳一带的茶叶贸易更大发展。

唐朝开始举国饮茶，据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所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即茶叶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下变成了中国的举国之饮。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销边，茶始收税，一句话，直到这时，茶业才真正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文化事业。《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包额甚多”，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良好的发展。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贩运。唐代中期后，如杨晔的《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唐朝开始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

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即“茶马互市”，官府控制茶叶的供应，以少量的茶叶，换取大量的战马。

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津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的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拥有水陆交通之便利的茶场，一到茶熟之际，各路商人，皆将锦绣缯綉，金钏银饰，入山交易，一时之间，茶樯泊集，茶商摩肩，繁荣异常。前来茶场的客商主要是浮梁商人。歌山与茶场好似一个三角洲，歌山处于练湖下游，而茶场从歌山下方二里处尚侃向北溯上即到达，两处陆路八里地。两个地方都是埠头，又有陆路连通，就在这里云集了许多商贾，从事茶叶的推销与贩运。

在唐代，饮茶之风已经盛行，“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被列为日常生活的七大必需品之一，东阳茶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东阳茶业在历史上直接记载的文字不多，但唐代遗存的治茶地名可以见证茶叶生产和销售的情况，诸如茶场、独山茶亭、茶米古道、茶院、茶埠头等地名都是早在唐朝就已存在。

茶场

如今巍山镇茶场行政村就是唐代榷茶制设立的治茶机构和贸易市场。它最早是一个管理茶叶专卖的场所，全称“榷茶场”。榷，即专利专卖，征税。茶场，历来为兵寨，茶场寨总扼台嵊，应接诸暨，东扼黄泥岭、寿端岭，西南扼歌山路，东北扼里柏岭，为境内总寨。（《东阳市志》1993年版）

唐朝政府榷茶加税，曾经因国库不足，加税茶农，初税一百，增之五十。唐建中年间（780—783），唐德宗采纳户部侍郎赵赞之建议，建立榷茶制，亦称“赵赞茶禁”，开始征茶税以补府库之不足。为茶农生产考虑的高官李珏曾奏本说：“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间之间，嗜好尤切”，（《李珏传》，《旧唐书》第173卷）可毕竟事关国库收入，榷茶制在德宗皇帝的支持下依然推行不误。

茶场南为东嵊驿道，古时候为东阳县和金华府东部到嵊县、绍兴、新昌、天台等地的交通要道。便利的交通条件，为茶场成为古代东阳一带最繁华的茶叶贸易市场奠定了基础。

独山茶亭

独山为茶场村东边的一块小山，因四面独立无依而得名。它东接鸟田畈，南靠茶院坞，西傍小溪，北依王宅溪的观音潭。道光《东阳县志》载：“独山，在县东五十里，高百丈，周十里。四望如城郭，中为深坞，唐宋时有司曾治茶于此。设茶院，名茶院坞，山左茶场市，下有刘烈妇祠。”唐时



供图：张纪华

建有水口殿。刘烈妇祠本为茶亭，三间楼房，旁配数间矮屋，设有许真君塑像，唐代始为施茶之所，且可借宿。此处在唐代是茶米商人从玉山到茶场的必经之地。

茶米古道

独山之北侧，是一条通往玉山的茶米古道。古时茶米商人，从茶场购得大米，马扛人挑到玉山的尖山尚湖出售，又从尖山尚湖收购茶叶运回茶场出售。至今，从鸟田畈之西崇福寺旧址至茶场村，尚存古道一千余米，基本保持原貌。

茶院

茶院坞，在独山的南面，茶叶种植面积大约两百亩。唐代，管理茶叶的官署在此设有办事处一类的机构，在此试种茶叶样品。村民反映，此地原先古松古枫冲天耸立，神秘感强烈，1935年后渐被毁坏。今为巍山赵氏所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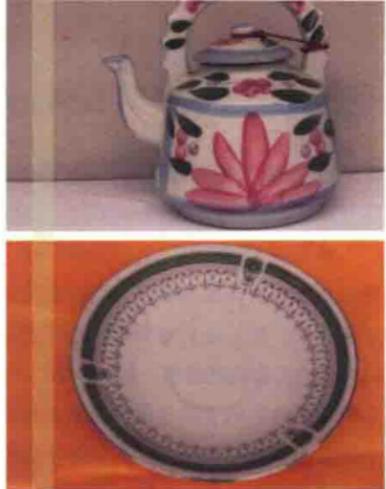
茶埠头

茶场边的王宅溪，又名谷溪，溪水流向尚侃而入东阳北江，有竹排可以下达金华兰溪，为茶叶的流通发挥重要作用。

除了具有明显茶字标志的地名以外，还有一些虽没有明显茶字标志却依然至今还保存与茶业有关的诸多古迹遗存，例如寨塘、寨塘殿：在茶场村的西边，曾经内供奉许真君，唐代就有石雕像，为茶米商人住宿处。村中凉亭：自唐开始就是一个茶亭，五间房子，终年供茶，为客商休憩住宿之处，今翻新为水泥结构，村民作古迹保留。郭园：在茶场村南侧，是茶叶贸易从榷茶制过渡到园户制的遗存。据传为郭姓长时期管理而得名。古窑场：茶场村东南和南两处，发现唐代生产茶碗的窑场：在孟公塘烂泥堆积层中，还发现大量的唐朝陶瓷碎片。由此可见。有古人曾在这些地方生产过茶具。

这些地名及遗存表明，古代东阳既有陆路来往，又有水路运输，交通便利，造就了茶场市场的茶商汇聚，茶事繁忙，销售旺盛的景象。

(郭承豪、华柯)



供图：张纪华

三、茶具的生产

1. 歌山窑生产的陶瓷类茶具。

歌山古窑址成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绝非偶然。

歌山位于大盘山余脉两大山脉的末端，恰在东阳北江出练湖的峡谷之处，所谓“山里尾巴洋里口”。

歌山是离茶场很近的木排竹筏埠头，但比茶场埠头要大得多，上可溯横锦、后田、西坑、八达，下可达金华、兰溪、富春、杭州，水陆交通非常繁忙。为了适应茶叶生产、消费、运销的快速发展，歌山窑厂也应运而生。歌山窑址在晋代就有生产两系、一执、一口、一嘴的鸡头壶茶器。（金华市2003年国际茶花大会《金华市首届婺州窑瓷文化研讨会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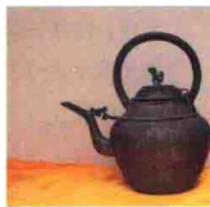
到唐代，骆宾王替徐敬业撰《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武则天搜捕骆宾王，骆氏家族隐居歌山窑作苦力。有了骆宾王后裔的参与，歌山窑群发展到顶峰，成为浙江省著名古窑址之一。窑厂的范围从歌山村的码龙山窑，经大坟沿，转骆夏山，弯象塘村，过戏台山前面坟山，入大片茶山，达坑山坞，一直到夏楼村的养猪场，计3平方公里，有窑床10余处，类似现今的批量生产。

歌山窑生产的茶壶、茶碗、茶杯、茶盏、茶盘、茶缸等，因色美质优而闻名。歌山窑釉色青翠，茶酒具质量特别好。部分茶瓷饰有花纹，花色有莲瓣、荷花、点线荷花纹、直线纹、几何纹等，注重大众化，经济耐用，适用于民间。唐代生产一种“鸡腿瓶”，可装茶装酒，形状像现在的花瓶，18厘米高，上部凸出处直径9厘米，下底直径5厘米多，既有上釉有光泽者，也有不上釉无光泽者，上釉不上釉在同一窑内均有。品茗专家喜欢不上釉的装茶，茶味更接近原生态。酿造百年陈酒也有用不上釉者，酒味纯真。

歌山窑的茶具显然和茶场茶叶等的销售联系在一起，茶叶与茶具销售相得益彰，所以受到陆羽的肯定。陆羽《茶经·茶之器》说：“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可见歌山窑生产的茶具受到肯定。

歌山生产的茶具非常走红，使用量大增。例如，寺院茶亭放置的茶缸、接待较多客人用的茶罐、放置茶杯用的茶碟、大口径茶碗、小口径茶碗，还生产瓜果盒，供饮茶时盛放佐料。

歌山窑的戏台山、仰瓦山、庵几里、骆安山等山坡上，已勘探窑址九处，码龙山、骆素坟、大坟、窑塘等地，已勘明窑址六处。每处窑址堆积范围较广，堆积层厚达2米，



供图：张纪华

窑床依地势采用不同窑制，多数依斜坡建龙窑，也有在山坡地建圆窑的。窑址年代为唐，红釉、黑釉、酱釉、乳浊釉瓷品均有，但以青瓷产品为主。其中乳浊釉产品从质地、厚度、硬度考察，比起6里路外的北宋初茶场窑的乳浊釉瓷品要早得多。器形以茶瓶、茶碗为主，兼有茶壶、茶罐、盘、盆、碟、钵等，另有匣钵、垫座、垫环、筒形罐等窑具出土，釉色大多呈青灰、黄褐或青黄色，釉层较薄。部分瓷器饰有花纹，花色有莲瓣、荷花、点线荷花纹、直线纹和几何纹等。

2000年，歌山村古窑出土了许多精品。唐代茶酒碗，高7厘米，碗口10厘米，碗底4厘米，青釉色，有手工花纹，形制极为漂亮。为经济实用，碗底不施釉。一只四系茶瓶，做了四个扭，可以用绳子串联起来吊挂，35公分高，上下口底皆为10公分，腹25公分。酒壶高20公分，腹18公分，底8公分，有制作精巧的茶壶嘴、茶壶柄，外刻荷花、菊花印纹，施青白色彩釉，里面只有茶壶颈部分施釉，腹下及底部无釉，显示了高超的烧造技艺水平。到了宋代，歌山窑的茶酒壶另加了菊花蕊的壶盖，更是向前发展了。

通过骆氏窑匠师的实践，码龙山窑继续发展。歌山村西有块矮山坡，为龙式窑群遗址。他们连续修建了十多条龙窑，使整块山爬满了龙窑，遂称“码龙山”。龙窑，窑床长从原来的30米延长到50米，宽从原来的11.2米增加到2米，倾斜角度从8~12度提高到12~20度，每烧一次，可装茶具、茶器近万件，而且把乳浊釉和青瓷一起以匣钵套烧法烧制，在当时是一项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山坡的倾斜角度和火焰自然上升的原理，使热量得到充分利用，既节省了燃料，提高了焙烧的成功率，又降低了成本。

在骆氏数十代人的奋发努力下，歌山窑在婺州窑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生产的优质出口茶碗等，一部分经过嵊州、宁波，流向海外，一部分经过江西转卖给外商，间接流向海外，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唐宋歌山窑的产品存在在日本、马来西亚等地的出土文物中。

1980年，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来东阳时介绍，他在日本、东南亚访问时，见到过许多含有歌山窑在内的婺州窑的产品。1986年，歌山窑、葛府窑（南马镇）出土的青瓷产品送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时，被专家誉为婺州窑之上品。

为适应茶叶饮用发展的茶具生产规模化、多



样化而定制的茶具增多，刻署工匠或定制者姓名以及生产年份的茶具也随之出现。

博物馆曾收藏歌山窑的一只唐碗，碗底有一个阴文刻字“贞”字。当时何以独用这么一个“贞”字？据《康熙字典》援引：“周礼有大贞礼，谓卜人事也。”又“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用这一个“贞”字，来占卜骆宾王身后有无出头之日，很可能是武则天时代，骆氏对时政的发泄，对骆宾王的肯定。

2. 东白山生产的纸质类茶具。

茶叶的贮存，陆羽认为用“纸囊”最为理想，尤以剡溪流域出产的“剡藤”为绝佳。《茶经·茶之器》记：“纸囊：纸囊以剡藤纸白厚者夹缝之，以贮所炙茶，使不泄其香也。”《博物志》说：“剡溪古藤甚多，可造纸，故即名纸为剡藤。”东阳东白山和玉山为剡溪上游，古藤甚多，盛产藤纸。唐代东阳籍作家舒元舆有《悲剡溪古藤文》留世。从晋朝开始东白山就以生产鱼卵纸名扬天下。青瓷和剡藤（纸）包装的出现，促进了茶叶销售的发展。人们对茶水、茶具的爱好与审美情趣，也随着社会饮茶风习、烹饮方法及各种茶具不断推陈出新而改变。

（郭承豪、华柯）



竹节首茶管



供图：张纪华

茶缸

四、茶水的煮泡

东阳茶水制作经历了煮、煎、泡等发展历程。

据华柯考证，南朝人的煮茶一直延续到唐朝。据陆羽《茶经·五之煮》称煮茶“或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斯沟渠间弃水耳，而习俗不已”。葱、姜等各地均有，橘子为南方土出，至今东阳人泡茶犹常放橘皮。东阳还有直接用茱萸、六月雪等泡凉茶以解暑的习俗。东白山上有薄荷岭，即因盛产薄荷而得名。

唐代开始兴起了“茶之为饮，无异米盐，上下竟啜”的“吃茶”之风。饮茶必上甜食，尝点心又必先泡茶，于是，糕点又有“茶食”之美称。饮茶之风推动了茶场糕点的发展，茶场市的糕点有好几家，一直沿袭到民国时期。

喝茶能静心、静神，有助于去除杂念，通向彻悟人生之路。茶道也被视为一种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一种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一种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它通过沏茶、赏茶、闻茶、饮茶，陶冶情操。

唐代是中国茶道的形成时期。东阳在唐代发明了蒸青制茶，茶叶品质得以提高，饮茶之风渐盛，虽未见于史料记载，却可从当时东阳的几大名人品茗诗作中窥见一斑。

1. 冯、滕、舒家族的品茗。

茶道一般分为修行类、风雅类、茶艺类三大类。“斗茶”“茶宴”出现在唐朝，品茶过程文人学士当场吟诗作赋成为一种时尚风雅的文化生活。

东阳有滕珦、滕迈、冯宿等风雅类茶道者。白居易与滕珦的唱酬有：“已见曾孙骑竹马，犹听侍女唱梅花”“儿着绣衣身衣锦，东阳门外数滕家”（白居易《送滕庶子归婺州》）等。白居易与舒元舆的唱酬有：“三岁相依在洛都，游花宴月饱欢娱”（白居易《送舒著作重授省郎赴阙》），“忽忆与宗卿闲饮日，又忆与考功狂醉时”（白居易《履信池樱桃岛上醉后走笔送别舒员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厌对俗杯盘，倦听凡丝竹”（白居易《苦热中寄舒员外》）等。白居易劝冯宿“乍来天上宜清静，不用回头望故山；纵有旧游君莫记，尘心起即堕人间”（白居易《冯阁老处见与严郎中唱和诗因戏赠》），善于斗茶的白居易劝其用清茶洗净尘心。冯氏大家族饮茶，需要的茶具可能是专门定制的。2002年10月中旬，歌山唐窑发现一个茶碗底残片，釉色均匀，刻有阴文“冯博记”三字（由华柯收藏）。这“冯博记”茶碗，可能是冯氏大家族饮茶的